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

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編

(供内部参考)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

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

上册

(报告集)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

书号 182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8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frac{1}{4}$ 插页 4

1965年3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共两册)定价 (6) 3.2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編輯說明

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在1962年联合举办“人道主义問題与現代文学”討論会。以后，在1963年，世界文学研究所将会議上宣讀的报告以及参加討論者的主要的发言稿輯成《人道主义与現代文学》一书出版。本刊这两輯增刊就是根据这个集子譯出的(上輯是“报告集”，下輯是“发言集”)。

由于編者的水平关系，編譯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希讀者指正。如果需要引用里面的材料，在注明材料来源时，务請用原著的名称及版本，并請核对原文，以求正确无誤。

要附帶說明的是：这里收入的諾維欽科的报告《“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洛米泽的报告《人道主义与国际团結》以及艾伊特瑪托夫的发言《人向人学习善良》都曾作为专文在报刊上发表，我們也曾將它們分別譯載本刊增刊《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及本刊1963年第1期(艾伊特瑪托夫的文章在上次发表时原名《善战胜一切》)，这三篇文章在收入世界文学研究所編的《人道主义与現代文学》一书时作者們虽略作改动，但基本內容沒有改变。为了完备起見，仍旧把它們收在这里。

书中各作者，凡是本刊在前几輯作过介紹的，均不再介紹。

1964年7月

上輯 目 录

俄文版編者的話	(1)
我們的入道主义概念	阿尼西莫夫 (5)
現代文学中关于人的观点	謝尔宾納 (17)
入道主义与国际团結	洛米泽 (79)
“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	諾維欽科 (111)
——我們时代文学中的全人类主题	
論俄罗斯文学的入道主义传统	叶尔米洛夫 (140)
——个人因素与全体因素的主题	
資本主义各国現代文学中的入道主义	
問題	薩馬林 (219)
入道主义与美学	盖 伊 (285)

俄文版編者的話

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在1962年举行了“人道主义問題与現代文学”討論会。

討論会由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書記苏尔科夫宣布开幕。他說：“亲爱的同志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五月清晨，我們在这里举行會議。我以为，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与这个日子頗为和諧的。

“人道主义問題对于那些想要深入探討文学过程的人們来说，一向是很为迫切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通过建設共产主义的新綱領以后，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了。新党綱空前响亮而有力地宣布，人們将要在地球上建設共产主义，将要为人們自己建設共产主义。毫无疑問，这个題目是我們在开始举行各种大規模的文学代表大会时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題目。

“这次討論之所以重要，也是由于人們再一次試圖把我国文学的学术研究部門与从事当代文学創作的人們的努力統一起来的緣故。”

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阿尼西莫夫致开幕詞以后，会上宣讀了下列几个报告：謝尔宾納的《現代文学中关于人的观点》、諾維欽科的《“我是人，我是共产党人……”》、洛米泽的《人道主义与国际团結》、叶尔米洛夫的《論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

传统》、薩馬林的《資本主义各国現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問題》和盖伊的《人道主义与美学》。

在討論会上发言的大約有三十來位文艺学家和批評家。作家別尔戈丽茨、艾伊特瑪托夫、扎雷金和梅登斯基积极参加了討論。

討論的参加者一致认为广泛討論人道主义和現代文学是合乎时宜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新党綱非常強調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人道主义內容。共产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社会的最高的人类理想，在这种社会里“自由人的能力和才华、优良道德品质将发揚光大”。

这次討論表明了研究人道主义問題对于理解現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規律性的意义，闡述了人道主义思想对于奠定先进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作用，首先是对于形成真实的和具有高度思想的艺术創作流派的作用；有許多报告和发言指出，个人迷信正是为文学的人道主义問題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損失。

現代資產階級美学和文艺学是傾向于假人道主义思想和直接使艺术非人道化的，討論会对那些代表这种美学和文艺学的現象进行了批評，并且指出那些把艺术的审美实质及其人的內容弄得支离破碎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

會議討論了当代苏联文学以及西欧、美洲、非洲和亚洲当代文学正在经历的过程，并且就我国現代人的新作品交換了意見。会上宣讀了未能亲自参加人道主义討論的查理·斯諾的发言。

这次討論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人道主义的討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发言者們都直接注意生活材料，提出了使我国現代人之为之激动而又和

人民生活最密切相關的問題。

黨政領導人在 1962 年 12 月和 1963 年 3 月同文藝工作者的兩次會見表明了這次討論會上所提出的各種問題的全部迫切性和尖銳性，表明了它們對於發展蘇聯文學的原則意義和思想意義，並且為提出十分重大的問題作了必要的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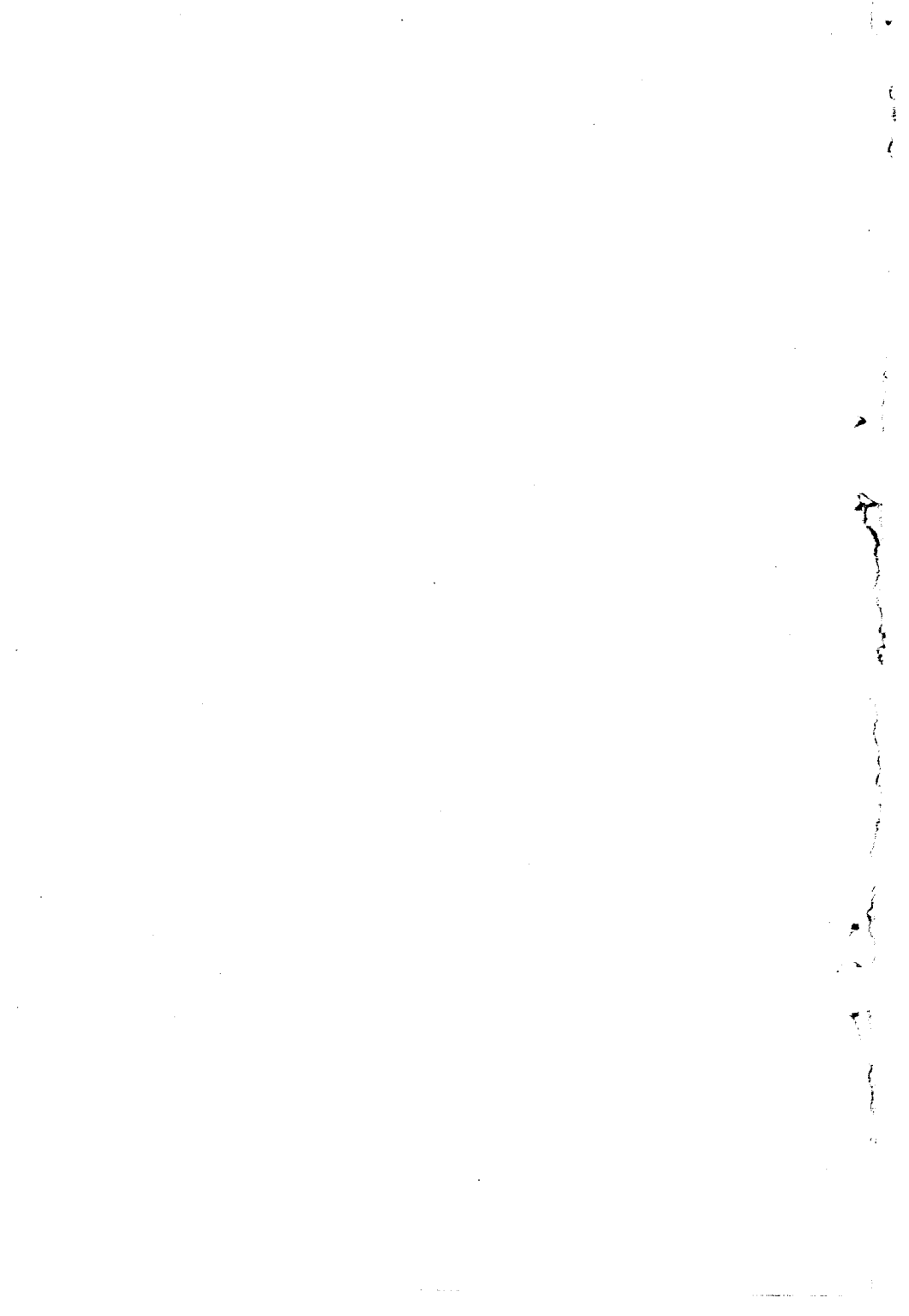
赫魯曉夫曾經在他的發言中說過：“我們必須弄明白人道主義的問題。在這裡，同在一切方面一樣，我們都要以階級的觀點，從保卫勞動者利益的立場行事。只要地球上還存在着階級，在生活中就沒有絕對好的東西。凡是对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好的東西，對工人階級就是有害的，相反地，凡是对勞動者好的東西，帝國主義者、資產階級就不承認。”

本書試圖表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對於在現階段使文學獲得繁榮發展的作用和意義。

現在發表的這些材料当中有在會上提供討論的報告，有一系列使廣大讀者最感興趣的發言。很多作者認為有必要擴充和補充自己的發言。這一點特別與別亞里克的文章有關，他在討論會上的發言曾經在《文學報》上引起過爭論。

這些材料是由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綜合理論問題組的研究人員德拉戈米列茨卡婭、叶爾米洛娃、基謝列娃、波德加叶茨卡婭和斯克沃茲尼科夫準備付印的。

范 修譯



我們的人道主义概念

[苏联] И. 阿尼西莫夫

出現于很久以前的人道主义問題，对于現代文学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来沒有这样尖銳过。

苏联共产党党綱如此全面、如此清晰地展示了“新世界的人道主义”，它使我們能够以真正的現代观点、并极其深刻地去闡明問題，这些問題不仅是人类历史所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出于对人类未来的責任感而提出来的。

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人道主义諸問題以及这些問題与現代文学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热切的关注。大会的工作充滿了对苏联人民和全人类幸福的关怀，貫穿着对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对人的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們摒弃了个人迷信，克服了阻碍并束縛理論思想发展的教条主义，因而获得新的可能去深入地、全面地闡明人道主义問題的現代意义。

人道主义問題对于苏联文学是具有迫切意义的，它們对于世界文学也是如此。

文学总是面向于人的，而人道主义問題則总是与文学直接相联系的。

現代的世界文學對於人的理解與對於人的能力的評價是各不相同的。從人道主義的觀點來看，在現代兩個世界體系中，顯現出了現代文學發展的一條對立路線。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人道主義帶來了新的解釋，並把它作為實際行動的綱領，揭露了資本主義沒落期資產階級思想力圖用以模糊一切人道主義概念的謊言。

這就是為什麼二十世紀的偉大作家的成長，常常要對一切精華進行很深刻的重新評價的緣故。

據我們現在所知，“克拉德”^①社的宣言，是西歐知識分子確立革命人道主義綱領的最初嘗試，它被寄給了列寧，現時仍保存在列寧的圖書室中，其上題辭云：“獻給第一個写出了未写完的偉大法典的列寧，請接受熱烈的敬意。亨利·巴比塞”。

從羅曼·羅蘭在自己的《與過去告別》一文——現代人道主義史上最主要的文獻之一——可以看到他在達到革命人道主義的頂峰之前，必然是經歷了一個萬般苦惱的動搖的過程的。

亨利·曼、蕭伯納、德萊塞的道路向我們指出：要揭露資產階級思想用以掩蓋一切人道主義概念的謊言，其過程是多麼複雜和具有怎樣的包羅萬象的意義。十月革命後，這些西方的大作家克服重重障礙，尋找着正確的道路。

我們的高爾基比其他作家更為充分地表達了人道主義的新觀點。他建立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理論，成為當代最有聲望的作家。他的有關人道主義問題的言論以及所下的定義，成了我們強有力的傳統，成了我們的武器。

蘇聯文學從它起源時候開始就是革命人道主義的文學，

① “克拉德”系“光明社”（歐洲知識分子國際協會）的音譯。該社由巴比塞於1919年組成，主張反戰，並同情第三國際。——譯者注。

而且高尔基总是凭借着它的迅速成长的經驗，来作出真知灼見的总结的。

对真正人道主义的探索，是要求解决創作中的主要問題的表現。当时从各个方面包围着苏維埃国家的资产階級世界中的进步文学曾經熱中于这种探索。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里，旧世界的进步的“文化大師們”尖銳地感到了抉择的必要。

西方世界許多正直的作家，感受到了在罗曼·罗兰的《与过去告別》中的以极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所表現出来的一切，而且其中不少作家能够采取了勇敢的决断和作出了决定他們未来命运的抉择。

世界文学中的进步力量，不断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周围集結。但是由于动摇不定、寻求妥协、缺乏与过去决裂的决心，因而很經常地妨碍他們作出抉择。这里可以举几个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例子。

优秀的英国作家阿尔丁頓^①早在二十年代就以杰出的小說《英雄之死》开始了对新的抉择的探索，但是，后来他对自己好像感到疑惧，就退縮了，只是在五十年代他才觉悟到：这是一个致命的退却，它阻擋了創作的激流，妨碍了他的全面发展。

抉择的問題就是在今天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問題。可以說，这是現代世界文学中的最紧要的問題。

我想举些其他也是属于英国文学方面的例子。

現代英国大作家查理·斯諾，为了使西方进步作家更广泛地領会苏联文学所作的探索，为了使这种与我們十分接近的人道主义观获得胜利，現在正进行着艰巨的斗争。

① 阿尔丁頓(1892—1962)，英国小說家。——譯者注。

斯諾不仅写过許多小說，而且还是政論家，也是在英美备受欢迎的演說家。

在他的最近的言論中，这位作家和学者（斯諾在写小說以前，在英国学术界起过重要作用——他是物理学家）为人类命运而斗争的責任感的調子、为人类未来而斗争的責任感，表现得愈来愈坚定、愈来愈明显。斯諾呼吁履行作家和研究工作者的职责。

就其精神而言，这是些极其进步的言論，是真正人道主义的文献。

斯諾的美学观是很有特性的：他是現代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和现实主义传统的保卫者与继承者，这种传统为那些自命为超现代派的批評家如恩格斯·威尔逊等人所不滿。

年青的約翰·布萊恩写过一些现实主义小說，在这些小說中，他坚决反对泛濫于現代社会中的腐蝕着人与人的关系的犬儒主义；他是約克郡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对人类尊严表現出来的强烈的希望，这些希望对于他的伟大的同乡勃朗特姊妹的小說，也是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作为艺术家的布萊恩是不同于斯諾的，但是职责的伦理观、对于本国人民与全世界的責任感的观点，使他們趋于接近，把他們一起引入了現代进步的民主运动的行列之中。

斯諾所一貫坚持的立場、他的信念的力量、勇敢和热情，是現代世界文学中的一种异常有趣的和富有特性的現象，它說明現代世界文学中正在发生着多么复杂的过程。

当然，抉择的問題就其現代意义而言，也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如果停留在英国文学范围以內，那么，我国大家所熟知的作家——格拉姆·格林的近几年来創作就可以說明許多

問題。

格林是一个在內心上与世隔絕的艺术家，他曾經发誓决不通过政治来解决抉择問題，也就是說，他受到一种資產階級世界用以束縛作家和学者的极为流行的幻想的支配。但是正如他的最近的一些小說（其中一部最新的作品甚至取名为《損失的代价》）可以深信无疑地证明，格林毕竟冲破了一切矛盾和他的成見所引起的犹豫，从而真正理解到人道主义的意义，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与英国和世界文学中的进步力量接近起来。

二

現代人道主义存在着与革命的观点相对立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請允許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并且就从薩特开始。

对于这位負有盛名的作家与哲学家所持有的人道主义观点，我們不能不与之爭論。回顾不久以前发行新版的薩特的《存在主义亦即人道主义》一书时，我們應該指出，在这位作者的各种不同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一个十分搖擺不定的評價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所得出的观点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高尔基常常使用“积极的人道主义”的这一用語，他赋予这个用語以非常重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首先是：如果人道主义不与“积极地厌恶一切痛苦，特别是由于社会經濟原因造成的痛苦的感情”相联系，那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如果記得这点，那末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觉察到，薩特的人道主义（而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遇到用来确定人的精神世界的概念，如表示忧郁、恐惶的“angoisse”，如表示孤立无援、被遺弃的“délaissement”），与我們所遵循的、可以与人类美德的概念等

量齐观的人道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

薩特笔下的人被恐惧所籠罩，常常感到自己是被遺弃的，只有从他了解到存在着許多类似于他的人这一点而言，他才是人道主义者。但他既不能帮助自己，也无力援助他人。这是一种普遍痛苦的人道主义，因而，薩特由于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念而以教条主义的罪名指責他們，是枉費心机的。

有趣的是，組成了有时叫“新小說派”，有时叫“反小說派”的法国青年作家标托尔、罗伯-葛利叶、克洛特·西蒙的創作，在最近期間也已經开始与某种特殊的人道主义观点联結起来了。不需深入研究这个問題就可以說，这只能是存在主义的、薩特的观点，不管怎样，早先为上述作家所乐于接受的那些“反人道化”、“非人化”的公式，現在似乎都开始混杂到了最渺小的“人道主义”的观点里来了。

1961年夏天，在一次很有权威的法国文学史家的會議上，討論了現代小說問題，如果对这次相当專門性的討論作最簡短的總結的話，那么不能不得出結論說：“新小說派”或“反小說派”距离真正的人道主义，就像它距离法国小說的伟大历史传统一样，真是太远了。这个要“确立以物統治人”的流派是沒有前途的。

討論会的参加者之一认为，从“内心心理”到“表层心理”的轉折，是現在变动中的最最典型的現象，前者曾在过去的法国小說中得到极为深刻的展示，而后者却是罗伯-葛利叶及其同伴所醉心于研究的东西。这位学者努力采取客观态度，企图在这种毫无生命力的“心理的表层”中，去发现有点点意义的东西，但是在这点上，他当然沒有成功。

就是法国晚近小說的其他研究者，同样陷于这种境地。

这一流派的空虛性质、敌視人以及例如为罗伯-葛利叶引以

自豪的概念“nettoyage”——淨化（指滌除作家所提出的任何概念或物体的任何感情的和思想的色彩）已經有些变得异乎寻常的明显了。自然，在这种僵死的、經過了蒸餾的靜寂中，是不可能存在着真正的生活、激情或人道主义的。

罗伯-葛利叶有一次說道：“作家是沒有話可說的人。”这完全不是奇談怪論，这倒是这一流派的美学公式，一般地說，这一流派是沒有話可說的。

我沒有時間向你們叙述一部非常富有特性的、簡直可以說是綱領性的作品——影片《去年在馬里英巴特》，这是导演阿伦·雷納（我們从影片《广島之恋》中已知道了）根据罗伯-葛利叶的电影脚本摄制成的。这是一部彻底排除了生活、真理、思想、任何激动心情的影片，片子长一个半小时，而这是充斥着死亡、无聊的忧郁和极度的空虛的一个半小时，这里确实是沒有話可說的。

使人唯一感到可惜的是：大有希望的艺术家的阿伦·雷納离开真正的人道主义道路是如此之远，离开原可以另一种方式决定他命运的道路是如此之远，而他受到虛假的美学的欺騙又是如此之深。他的影片，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的失敗。

回过头来再看巴黎举行的“新小說”問題的討論会时，我們不能不在这里提到对我們的攻击，它是得到了第一个报告人米代里·別托尔的认可的。既然“新小說派”或“反小說派”的代表之一和我們进行論辯，那我們就应回答他。別托尔宣称：“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說，它只是群氓运动和个人奇遇的简单的結合，而不在其間确立真正的联系……它在揭示某些人的积极性的願望上，一方面，仅限于表現消极的群众，另一方面，仅限于表現个人的奇遇，而这种奇遇又是已失去了一切真正的特

色与它同展示它的环境的联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家，尽管抱着各种良好的愿望，但他总是一个孤立于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群氓中的个体……”

这样，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不能了解个体与一般的统一，说我们的英雄与“群众”，像别托尔所说的，被不可逾越的鸿沟分隔着。

如果这样知识渊博的（就他的报告来看）作家没有想到别的什么，那正可以说明：这或者是由于蒙蔽人的纯粹的偏见，或者就是由于别托尔根本就没有亲眼见到过他所谈到的小说。

“新小说派”或“反小说派”的理论家，在现代城市的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丢失了人，而且甚至以此自豪。无论如何他们似乎是不应该教训我们这样去了解人们。

三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不仅与人类自尊感、而且也与我们的历史责任感紧紧相联的。它与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观是不相容的。对于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观说来，历史似乎并不存在，而革命的人道主义总是与反对一切危害人和人类的东西的斗争联系着的。

苏维埃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诚如高尔基巧妙地说的，这是“新人类中的人”。我们的人道主义，是具有伟大创造作用的人道主义。

我们在这里可以满意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体中，正开展着有关现代人道主义问题的巨大的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比如，我们的波兰友人亚当·沙夫的一部杰出的和内